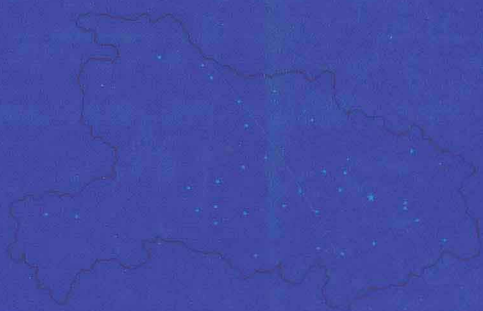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2004年蓝皮书

湖北经济社会发展 课题研究



崇文书局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2004年蓝皮书

2

湖北经济社会发展 课题研究

曾成贵 主编

崇文书局

(鄂)新登字 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课题研究 / 曾成贵主编. — 武汉:
崇文书局, 2005.1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004 年蓝皮书系列)

ISBN 7-5403-0856-7

I.湖... II.曾... III.①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
究—湖北省②社会发展—研究—湖北省
IV.F12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2765 号

责任编辑: 邹华清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430070)

印 刷: 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 430074)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4

字 数: 266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前 言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党中央要求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发挥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

早在1997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就开始实施“社科下乡”活动，组织本院专家学者，就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进村入厂，开展调查研究。这项大规模的调研活动，每年集中开展一次，持续至今。2004年，这项活动被省委宣传部评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奖。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直接向本院提出当前需要着力研究的重大问题，“社科下乡”活动进而围绕探讨、调研这些重大问题而展开。本院集中人力、集中时间，分赴全省各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努力做到“四个发现”：发现典型，加以推广；发现问题，提出对策；发现点子，解决问题；发现规律，总结经验。

调研活动形成的成果，通过本院主办的内部刊物《要文摘

报》，报送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决策参考。本书所汇集的调研报告，即为 2004 年度本院重大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本院组织院内有关科研单位撰写了理论文章，现一并收入本书。

本书编纂的组织协调和出版工作，由院科教处承担。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本书编委会

2004 年 12 月

目 录

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和发展	[1]
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16]
浅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	[30]
经济全球化与人才竞争国际化对湖北省 人才队伍建设的影响和对策	[44]
湖北国有企业改革与改制调查	[76]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振兴湖北老工业 基地比较研究	[90]
武黄鄂城市率先实现一体化研究	[107]
宜荆荆城市圈与襄十南城市圈研究	[122]
关于湖北建设现代物流中心区的研究报告	[141]
湖北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研究	[154]

农业招商：破解“三农”问题的金钥匙

——对 20 个扩权县市调查引发的启示 [170]

湖北省市州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

若干问题 [189]

湖北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调研报告 [203]

湖北省化解村级债务问题研究 [220]

湖北省改革与开放互动研究 [236]

重塑湖北的区位优势

——我省与周边四省改革开放的比较研究 ... [252]

湖北文化省情研究 [266]

做强做大的必由之路

——湖北省文化产业集团深化体制改革

若干问题的思考 [292]

湖北县域文化调查 [304]

如何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17]

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和发展

执政理念是一个政党围绕执掌政权的宗旨、目标所形成的执政理论和观念，主要解决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如何执政等基本问题。执政理念贯穿于执政党的执政方略、执政方式、领导方式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各个方面。科学的执政理念，是执政党正确执政、科学执政的思想基础，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前提。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贯穿着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执政理念，把执政理念放在党的建设系统工程中要进行努力的各个方面的首位。“决定”提出并深刻阐述的执政理念表明了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正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对党的科学的执政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今天八十多年的历史，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方位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在延安时期对于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党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执政理念作了深入的思考。1944 年，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

发表后，毛泽东同志就把这篇文章作为整风学习文件，告诫全党要吸取李自成农民军“打江山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的教训，执政后决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共产党能否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时，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里回答的就是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如何才能长期执政的问题。关键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全国解放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在全国胜利后要坚持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不脱离群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党的工作要实现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要学会做我们不熟悉的经济工作和管理工作，“向一切内行的人学经济工作”。实际上，就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如何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如何巩固政权，防止腐败变质，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思想理论观点，例如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理论，提出了把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的思想，提出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的各种关系，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强调执政党的建设，抵御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告诫全党决不能“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但是，在对执政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工作重心和主要矛盾的认识上，曾经发生很大曲折和失误。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和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的失误，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在国内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仍然把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放在中心位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致使全党工作重心未能及时有效地实现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

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深刻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我们党执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通过拨乱反正，恢复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群众运动为主要形式的“大民主”，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实现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命运。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全党要把“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

不拥护”作为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积极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大力推进法制建设，努力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到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转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上与时俱进和重大创新。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集中全党智慧，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贯彻，从根本上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执政为民、执政兴国、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更好地创新执政理念和提高执政能力，更好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

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认真总结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提出和深刻论述了党的执政理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理念，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这些执政理念的提出和贯彻，体现了党对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科学判断和高度自觉，是中国共产党走向进一步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一再强调以民为先的为政之道，到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十分清晰地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并把它作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在实践的标准中引入了人的尺度，把现实的人当作根本的依据，当作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落脚点，为解决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前提。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真正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超越了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

哲学范畴，不满足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强调“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中肯定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②，他抓住了“人本身”这个根本，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明确地重申，现实的人是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主张“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恩格斯干脆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③，这一学说确认：“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④，因而，“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从这种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这体现了逻辑与现实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一方面把逻辑的起点建立在坚实的现实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概念之上；另一方面也为历史找到了真正的主体，使历史不再是抽象概念的运动，进而创立一套以人为本、以实践为基础的全新的哲学话语体系，完成了从古典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的话，那么它的理论必然是这样一个无限展开的形式：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

序言——以现实的人为核心所展开的论证——以现实的人的解放为最终归宿的结论。它鄙弃了一切宿命论，把现实的人当作历史的主体，当作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从而打开了历史奥秘的大门。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以人为本，确立了现实的人在自己学说中的核心地位，从宗教的，也从黑格尔的哲学的，以及从包括现实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拜物教中将人解放出来，使现实的人在追求自由解放的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太阳。这或许正是马克思能够被公认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的原因之所在。新一届党中央强调建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出发点，从而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视野，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前提，顺理成章，它将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认同和对社会普适价值的确认。以人为本的话语直接来源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自《尚书》明确提出“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开始，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民本成了各个朝代异口同声的流行话语以至延绵不断，不胜枚举。而最早直接使用“以人为本”提法的是唐本的《管子》，其《霸言》篇有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清戴望的《管子校正》云：“‘人’作‘民’、‘理’作‘治’是也，今本系唐人避讳所改。”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管子》所说的“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以民为本”，它不过是《尚书》的翻版而已，没有什么新意。这种传统的以

民为本的重民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说国之兴亡在于民之向背；二是说民乃衣食之源。尽管民本话语在不同程度上迎合或反映了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追求人性的愿望，对于他们来说，民本话语最多也不过是他们向君主表达人性欲求的“未来时”；而对于君主来说，实际上，这种民本即重民的思想并非要把人民群众当作执政的最初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而是当作维护君主制度稳定、巩固统治者地位的手段罢了，其出发点和目的还是统治者自身，当然更谈不上现代意义了。

现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由工业革命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发展起来的，它直接起源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人为本是一种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终极目的的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它把人自身视为最高价值和最终指归，其基本内涵是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它表现为对现实人的自由和平等的不懈追求。它是一种启蒙精神，是特定文化的基本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代表了一种时代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以人为本思想的最高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普适价值，这种现代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它表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成效，影响了人们观念上的变革。可见，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实际上是对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认同，是对现代社会普适价值的确认。在这里，“以人为本”这个源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话语被赋予现代的意义。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体现了人的价值尺度和客观尺度的统一。在改革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人

们开始接受中国必须走发展之路的道理，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只能在不断探索中前进。而科学的发展观所要把握的正是这种探索的大方向，它关注的是发展的意义，追求一种“合理的发展”，从而解决“为什么发展”和“怎样的发展才是合理的”等关于发展的根本问题。现实的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因而也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和核心，只有人才能赋予社会发展以意义。因而，也只有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才是科学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立足于科学的价值判断基础上，把人的尺度引入到实践的标准之中，强调社会的发展意义不在于社会经济单方面的增长，而在于不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因此，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已经包含了价值尺度与客观尺度的统一、功利尺度与道义尺度的统一、局部尺度与整体尺度的统一、现实尺度与未来尺度的统一，这正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科学发展观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分析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关系入手，不仅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衡量历史，而且从人自身发展的状况来衡量历史，把人的尺度当作衡量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尺度。马克思正是依据人的尺度把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从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来看，离开了人的尺度，科学的发展就是盲目的，它将给战争配上现代化武器，使人类面临着毁灭性的核威胁；同样，离开了人的尺度，生产力的增长就会失去方向，从而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只有当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幸福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它是进步的。所以，不是人

必须服从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应该为人的目的服务。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来看也是如此，它同样必须以人的尺度来衡量，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切实尊重和保障个人的权利，充分发挥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人们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真正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人。可见，对于历史的认识和评价，一刻也离不开人的尺度。而在认识和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人的尺度的确立，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的确立。

科学的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坚持了人对自然的责任和人对自身的责任的一致性，这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现实中社会劳动的异化，经常造成自然界与人的本质的对立，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破坏自然，其结果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枯竭、自然环境的污染以及自然生态的失衡等等，人所创造的自然又反过来无情地报复着人。要解决现实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对立，在实践中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里，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也就是坚持以自然为本的原则，二者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由此通过实践，自然就会真正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人类社会就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统一。

三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是党积极、主动、勇敢地迎接新的考验和挑战的重大战略部署。然而，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可或缺的重